

仲勋同志教我如何搞调研

在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时，笔者采访了曾任北京工业学院（现为北京理工大学）院办主任、工会主席的离休干部任楚，他介绍到自己青年时期曾接受过习仲勋同志的领导和教育，特别是在如何搞好调查研究上受益匪浅。

□ 任 楚/口述 叶介甫/整理

弼时叔叔让我向仲勋同志多请教

我和仲勋同志相识在延安，遥想当初我们在一起工作和生活的日子，回忆他那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平易近人的品质和对人民的赤诚之心，禁不住心潮起伏。

1943年2月，仲勋同志担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我是1943年7月至1945年8月在绥德分区建设科工作。在仲勋同志领导下工作两年多这段时间里，他对我政治上关心，工作上教导，生活上帮助，使我终生难忘。

仲勋同志年长我8岁，他早年就接受革命思想，十几岁已参加了革命。多年的革命生涯，尤其是历尽坎坷，使他在工作上凸显出卓越的领导才能。仲勋同志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工作，经常通过会议和报告等形式反复提醒和教育各级干部要重视调查研究。他自己也经常下基层走访调查，座谈讨论，广泛听取干部、群众包括地方士绅等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意见。鉴于当时绥德由中央和各根据地调来许多干部，他提出要正确处理好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之间的关系，彼此学

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我就是在这个时候从延安来到绥德的。

记得当时去绥德，弼时叔叔把我叫到他的窑洞，对我说：“你父亲（任作民，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刚刚去世，中央考虑到你的情况，准备安排你去绥德工作。你还年轻，要好好学习，加强锻炼，严格要求自己。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同志是一位年轻有魄力的领导干部，要多向他请教学习。我已经和他打过招呼了，让你多给你压担子，为将来多学些本领。”

仲勋同志提醒我不能当群众的老先生

来到绥德后，仲勋同志找我谈话，他首先鼓励我安心基层工作，提醒我说：“基层不会屈才，你年轻，有干劲，这是你的特点，但要记住，工作不是仅凭这些，要多动脑，多思考，才能少走弯路。”并说：“做基层工作说难也易，只要你深入，一深入就好办，做群众工作要与群众打成一片，不能当群众的老先生，工作上虚心，群众就会跟随着你干。”

仲勋同志的话使我这个从未到基层作过调查的人深受启发。在我离开他办公室时，他交给我一项任务，让

我带几名同志去米脂县搞农村调查。并指示我说：“先了解一下米脂的基本情况，不要急于下去，心里有数了，才能在调查中做得更有目的性，查找的问题才会有针对性，回来后总结就有指导性。”

接着又说：“下去以后，不要只往基层跑，也要注意多向县委的领导汇报，多与县委的同志们学习、沟通。”这是我受领的第一个任务。半个月后的一个上午，我和调查组的同志正准备去米脂县做调查，碰巧遇到仲勋同志，他特意把我叫到一边对我说：“小任，这次去调查一定要细致，不要走过场。”

在仲勋同志的亲自指导下，我和其他调查组成员一起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接着，深入到米脂县杨家沟的农村进行调查蹲点，和当地村民、村干部进行座谈，与农民一同劳动，一起生活，了解了当时农村生活改善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农民也愿意和我们说实话，讲真话。

回到区委机关，我们向分区写了一份两万多字的农村调查报告。仲勋同志看到报告后，非常高兴，给予了鼓励和表扬，并指示地区宣传机构将调查材料打印下发各县，指出各县也应当对农村进一步深入调查，做到心

中有数，以便于工作中参考。

跟随仲勋同志到郝家桥村调查

我到绥德工作时住在郝家桥村，仲勋同志知道我在这里，还亲自到这个村蹲点指导我的工作。

1944年4月中旬的一天，仲勋同志带调查组来到郝家桥村，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蹲点调查。仲勋同志将调查组按照自然村进行分工包村，确定了各自的调查内容和重点。他要求在普遍调查的基础上，选择生活状况和生产条件不同的上、中、下各两个农户进行调查研究，从中发现典型，总结经验。他还倡导在各村召开“好劳动人会”，评选劳动英雄。郝家桥群众一致推选刘玉厚为劳动英雄。仲勋同志向我了解情况，我告诉他：“刘玉厚既是新政权的村主任，又是乡参议员，在此之前他还担任该村的减租会的检查委员，积极宣传贯彻党的减租政策。近年来，他和家人通过终年不息的辛勤劳动，带动了全村农民在有限的土地上，精耕细作，变工互助，合理安排生产，使这个佃户村粮食产量和农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圆满完成了减租保佃、征收救国公粮等各项任务。”仲勋同志听后非常高兴，夸奖

我调查工作做得好、做得实。

仲勋同志到郝家桥后，即邀请刘玉厚和该村村支书到自己住处叙谈。一见面他就拉住刘玉厚的手问道：“是党员不?”

“咱是”。刘玉厚用浓重的陕北口音和方言回答说。

刘玉厚问：“呃！你是住在九贞观地委的习书记？夜里你们来时咱一满（陕北方言‘完全’的意思）没知道，刚从地里回来，人家就催咱来开会了。”

“好！好党员，好同志，现在就需要像你这样的党员，咱的党就更有办法！”仲勋同志拍着刘玉厚宽阔的肩膀，然后又紧紧握住刘玉厚粗大的双手。

“咱什么也解不下（陕北方言‘不知道’），只解下受苦（陕北方言‘只知道受苦’），党要咱努力生产，那是容易事嘛！”刘玉厚朴实而坚决地表示了自己的决心。

仲勋同志通过调查认为，郝家桥在改革农业生产措施，理顺土地租佃关系，改造二流子，组织群众移民南下，实行变工互助、精耕细作等方面都很有典型意义和推广价值。他认为刘玉厚勤劳忠诚、廉洁奉公，全家亲密和睦，全村团结一致，发展了生产，支援了抗战，改善了生活。经他提议并通过，地委研究决定，授予刘玉厚模范党员、劳

甘为“焦官”的谢觉哉

“你们会说我这个官是‘焦官’（湖南方言，指不挣钱的官）。是的，‘官’而不‘焦’，天下大乱；‘官’而‘焦’了，转乱为安。”这是1950年1月，当湖南家乡的亲人提出想到北京找个好前程时，谢觉哉在回信中的一番话。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谢觉哉始终牢记共产党员的身份，用纪律约束亲情，为今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 马延炜

“我们是一身许国的共产党人”

谢觉哉一直对家乡和亲人怀有浓浓的眷恋之情。大革命失败后，他离开湖南，从此与家人音讯不通，直到10年后才得以再次通信，也因此对故乡的妻子儿女十分愧疚。1939年，在写给妻子何敦秀的信中，他说：“四十一年当中，我在外的日子占多半，特别是最近十几年，天南地北，热海冰山，一个信没有也不能有……家庭生活儿女婚嫁的事，我从来没有管过，现在更来不及管。这付繁重的担子，压在你的肩上，已把你压老了罢！我呢，连物质上给你的帮助，都很少很少，这是对不起你的事！”女儿谢蔼英在谢觉哉离家时才10岁，成年后曾有信盼其聚首，未料不久即病故，父女二人终未能再见。消息传来，谢觉哉悲痛地写下一首《哭蔼英》：“欲哭无从哭，十九年前貌恍惚。欲哭苦无泪，丧乱重乡里隔。我离家，汝尚稚。惭我拙，教养疏。依母朝朝事劳作，望父年年消息恶……”

谢觉哉虽然对亲人怀有如此浓烈的深厚情感，但也十分注意以党的纪律来约束亲情。入党后不久，他就抱定了为革命献身的志向，对前来投奔的弟弟说：“革命前途未卜，我已以身许党。”作为领导干部，他总是率先垂范，树立楷模。延安时期，谢觉哉就提出党员要做群众的模范，认为“中国共产党是

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者，要广大群众跟着我们走，不是命令或统治他们，而是靠党员的模范作用”，如果“州官可以放火”，哪能去“干涉百姓点灯”，“公家人”必须是自觉“遵守法令的模范”。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先后担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多个重要职务，面对亲友们纷至沓来的各种请求，他坚持原则，称自己在外是做“工”，而不是做“官”。面对家人的不理解，他语重心长地告诉他们，“我们是一身许国的共产党人”，“共产党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不能多拿一个钱，他的生活不能比一般人高”。

“不要认为地位高的人可以说情”

谢觉哉特别重视对亲属的教育和约束，他曾说，“人民革命，替人民造下一发展机会，并不能也不应给人或一部分人以不费力的好处”。从不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亲友谋取利益，这在他与亲属交往的许多事情上都表现得十分明显。

在谢觉哉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长的消息传到家乡后，乡亲们议论着，穷山沟里出了个大官，真了不起，家人们也想到北京去找个好前程。当两位久未谋面的儿子提出想搭便车来北京看父亲时，谢觉哉说：“儿子要看父亲，父亲也想看看儿子，是人情之常”。但他同时又委婉地拒绝道：“刻下你们很穷，北方是荒年，饿死人；你们筹

措路费不易，到这里，我又替你们搞吃的住的，也是件麻烦事……”打听便车是没有的。因为任何人坐车，都要买票。”1956年，80多岁的堂哥谢凡宣写信请求其为家乡友人后辈推荐工作，谢觉哉回复说：“无论什么机关、厂矿招收员工，都要经过考取或由一定机关调用。没有可由私人推荐的，荐了也没有效果。”1960年，当外孙姜忠提出调动工作想请外祖父帮忙时，谢觉哉回信说，“姜忠调工作的问题，我不知道说不可调，如果可调，姜忠可以自己请求，如不可调，那旁人说也是空的”，并告诫家人“不要认为地位高的人可以说情，这是旧社会的习气”。

谢觉哉对亲友的约束还表现在其他许多方面。1962年，湖南宁乡一带滥伐林木成风，谢觉哉故居南麓冲附近的山林遭到严重破坏，谢氏孙辈谢金圃、曾文义等人向有关部门反映未果，便赌气在自留山内滥伐树木，受到了处罚。事后，谢金圃给谢觉哉去信，希望得到祖父的支持，没想到谢觉哉在回信中严厉地批评了他们，并要求他们在社员大会上作检讨，而且不止一次，要直到大家不要他们检讨了为止。谢觉哉还对这些亲属说：“我年纪老了，身体衰了，可能不会再到宁乡了，也不打算再回去，即便到宁乡，也不想再到南麓冲。你们也不要来，除非你们变成了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生产的积极分子，变成了育林、护林的模范或先进分子，到那时你们再来，也就不觉得惭愧了。”

“我们是共产党人，你们是共产党的子女”

谢觉哉前后有过两段婚姻，共有有子女10余人，其中不少是在他年过半百后所生。对于这些孩子，谢觉哉在疼惜之余却没有丝毫溺爱，一直教导他们树立正确的身份观和价值观。

1962年3月，在一封打印后散发给子女们的信中，谢觉哉说：“我们是共产党人，你们是共产党的子女。共产党是人民的勤务员，要帮助广大人民能过好日子，要工作在先享受在后，当广大人民还十分困难的时候，我们过着这样的生活，应该感到不安，而绝不应该感到不足。”他经常教育子女，“凡自己能做的事，都要自己动手”，不能因为是高级干部的子弟就搞特殊。“凡学习或工作，都要自己负责，做不好或做得好，都要自己检查。记住，作为下次做的教训。”他曾对女儿谢冰茹说：“不论做什么，自己总要出力、用心，是人家信任你，组织上需要你；绝不可依靠人家照顾你。”当部分儿女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想法时，谢觉哉告诫他们：“入党不止是组织上批准你入党，而是要你自己总想行动像个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人。”

谢觉哉十分注重对子女道德品性和个人素质的培养，小到说话写字，大到工作生活，到处都可以看到他的教诲。他多次告诫年幼的子女要爱惜书本文具和生活用品，知道“来之不易”，“不可进了中学就丢了小学的书，进了高年级就丢了低年级的书”，“衣服包括鞋子、袜子、盖被、褥子等，脏了要洗，坏了要补，要爱惜，收藏得好，不使它坏”。儿女们的家信中出现了错字、脱字，他则立刻指出，要他们改正。

□ 党史故事

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是历史的、具体的，不同的历史阶段，共产党员不变的是“初心”，与时俱进的是时代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绿色生活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举措，绿色生活正逐渐成为一种时尚，并释放出越来越大的绿色能量。共产党员作为先锋模范，绿色生活应当也必须成为每个共产党员的一个时代标签。

我们不能说一个践行绿色生活的共产党员就一定是合格的共产党员，但一个不践行绿色生活的共产党员却很难说是合格的共产党员。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特别强调：“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正如他所忧虑的，奢靡浪费之风在之后各个阶段都曾出现，一些时期在有的党政机构和党员干部身上滋生蔓延甚至恶化，引起群众强烈反感，严重消解着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践行绿色生活是任何一个胸怀崇高理想的政党的必然要求，也是任何一个有抱负有情怀的共产党员应具有的可贵品行。在这方面，习近平总书记为全党作出表率，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他说：“我个人爱好阅读、看电影、旅游、散步”，“现在，我经常能做到的是读书，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地反“四风”改作风，倡导节约绿色低碳生活的理念犹如一股股清泉，渗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要使绿色生活方式真正成为共产党员的时代标签，既要注重培养绿色生活理念，也要依靠法规制度约束，但关键还是要靠个人自律。每名党员都要严于律己，秉持节约为先，力戒奢侈浪费，从衣、食、住、行、用等小事做起，不以事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比如：合理控制室内空调温度，减少电器设备待机能耗，节约每一度电；上下班坚持步行、自行车和公共交通等低碳出行；办公纸张两面打，节约每一张纸；减少使用一次性日用品，个人闲置资源及时回收，等等。只有在这些细小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尽到责任，才能充分发挥共产党员在引领全社会践行绿色生活中的示范带头作用。

一滴水中看世界，半瓣花上品人生。肩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共产党员必须担当历史责任，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培育勤俭节约、低碳绿色、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自觉当起践行绿色生活的中坚力量，引领全社会共建天蓝、地绿、水净、山青的美丽中国。

践行绿色生活是共产党员的时代标签

□ 杨会军

□ 党史人物

□ 党建时评

动英雄称号，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村村学习郝家桥，人人学习刘玉厚”的活动。一块由仲勋同志和袁任远专员等领导共同署名、刻有“农村楷模”的牌匾奖给了郝家桥村。

蹲点调查结束后，仲勋同志还批准了调查组根据郝家桥的经验制定的绥德地区移民工作方案，使刘玉厚的事迹和郝家桥的经验在绥德地区以至全陕甘宁边区广泛传播开来。至此，绥德分区各县都纷纷动员起来，男女老少齐上阵，热火朝天地开展了一场大生产运动。这场运动不但在农业上增产了粮食，在工业方面也获得了很大成就，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的封锁作出了贡献。

我在工作实践中顺利成长

在仲勋同志的关怀下，我在分区建设科两年多的工作都比较顺利，特别是学会了如何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这是仲勋同志言传身教的结果。

记得我每一地调查，仲勋同志都要给当地的领导打招呼，并要求我们多听地方干部的意见，主动向县委领导汇报工作情况。根据仲勋同志的指示，我去各县做调查工作时，他们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帮助，而且在生活上给予了热情关怀。如，我在米脂县杨家沟搞农村调查时，县委书记冯文彬专门派了两名县机关的干部协助我搞调查。他们对农村情况十分熟悉，使我在农村调查得以顺利开展。每次调查回来，我们都将情况向仲勋同志和袁任远专员汇报，他们也都对我的工作给予肯定和鼓励，并对今后如何做好工作提出具体意见。这对我的顺利成长起到了重要作用，增添了干好工作的信心和勇气，使我能逐渐成长为一名党和国家的有用之人并在工作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仲勋同志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不断前行！